

【中东研究】

# 回顾与前瞻: 1947 年以来的印度伊朗关系

赵兴刚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印度与伊朗自 1950 年 3 月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由于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教派冲突、结盟与不结盟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使得印度伊朗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面向 21 世纪, 印度与伊朗于 2001 年确定建立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固然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但是, 巴基斯坦阴影依然难以驱散, 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 伊斯兰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伊朗外交, 印度国内的教派冲突也将长期存在, 因此, 印伊“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关键词:** 印度; 伊朗; 关系; 问题; 前景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4)03-0120-05

印度和伊朗分别作为南亚和中东的地区大国, 有着深远的文化根源、共同的传统和历史联系, 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仅有着良好的历史、物质与现实基础, 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印度自 1947 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取得独立以来, 历任领导人一直强调同伊朗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印度与伊朗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第一, 印伊两国有着良好历史传统联系。印度人和伊朗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中亚和帕米尔迁徙至印度和伊朗的雅利安人, 他们出自同一个祖先, 在文化、信仰、语言和文学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尼赫鲁总理就曾指出: “就人种来源和整个历史的关系而论, 很少民族有比印度民族和伊朗民族更为密切的了。”<sup>[1]</sup> 印度与伊朗的传统联系与友谊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历史情感基础。第二, 印伊两国没有领土争端。自 1947 年印巴分治后, 印伊两国原本领土接壤、互为邻邦的现实不复存在, 因此, 没有任何领土争议, 这是发展友好关系的有利条件。第三, 印伊两国有着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印度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来自中

亚、伊朗和土耳其的入侵者从西北穿过开伯尔山口和其他关隘, 在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因此, 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关注稳定和安全问题, 尤其是西北部的安全稳定。尼赫鲁深知与伊朗建立友好关系对印度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强调“毫无疑问, 在最近的将来, 印度要和伊朗更趋接近”<sup>[1]</sup>。第四, 印伊经济互补性强。印度与伊朗发展友好关系, 对于它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意义重大。然而,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战后印度与伊朗关系的发展经历了颇多坎坷曲折。纵观印度伊朗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 5 个时期:

1. 冷淡时期(1947~1955 年) 自印巴分治后, 印度一直寻求与伊朗建立密切关系, 一方面是由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 另一方面印度试图通过加强与伊朗的经济合作为突破口, 削弱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 压缩巴基斯坦的战略生存空间。而伊朗从意识形态出发, 对战后初期前苏联通过拥戴人民党以动摇伊朗君主政权感到担忧, 希望密切与印度的关系, 以减缓自身的地缘政治压力。第一, 加强经济合作, 促进印

收稿日期: 2003-02-28

作者简介: 赵兴刚(1963), 男, 陕西合阳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主攻方向为当代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伊关系正常化。1948年印伊两国签署了《印度伊朗航空运输协议》，1954年12月签署了《印度伊朗商业和航海条约》，加强了双边经济联系，使两国贸易迅速增长。1954年印度从伊朗进口货物价值为680万美元，到1955年和1956年又分别增长到4240万美元和5790万美元。先经济后政治，以经贸关系带动政治关系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印伊关系发展的特点。其次，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印伊正式建交。1950年3月15日，印度与伊朗在德黑兰签订了《印度政府和伊朗政府友好条约》，两国决定自即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条约规定：“伊朗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应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并且两国政府应在两国民间致力促进这种和平友谊。”<sup>[2]</sup>

印伊两国虽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这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印伊之间的分歧。首先，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伊朗政府基于地缘、宗教、政治和安全的考虑，优先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印巴争端中支持巴基斯坦，承认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严重制约着印伊关系的发展。第二，对中东事务观点歧异。独立后的印度与埃及等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密，视纳赛尔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而巴列维国王则认为纳赛尔主义是对伊朗君主政权的威胁，印伊双方互不信任，对中东事务的看法各异，严重影响到印伊关系的发展。第三，对伊朗收回石油租让权的态度不同。尼赫鲁对1951年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保持中立，一方面指责英伊石油公司的行为不明智，另一方面批评伊朗采取的强硬、不妥协态度，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总之，印伊关系因存在许多分歧，始终处于冷淡状态。

2. 紧张对抗时期(1956~1967年) 5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出现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峙与斗争，使得南亚、中东国家面临着新的安全形势，伊朗与印度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对外政策，印伊关系走向紧张对抗。

印伊两国紧张对抗的主要表现有：第一，结盟与不结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尖锐对立。战后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对峙以及英、苏争霸中东的局势，伊朗国王巴列维为了对付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寄希望于美国为伊朗提供安全保障，主张通过与西方结盟，从美国进口军事装备和武器，以增强自身的安全利益，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尼赫鲁坚持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并认为结盟政策有可能使大国卷入国际及地区事务，必然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从而危及世界和平。所以，1955年10月

当伊朗宣布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尼赫鲁谴责巴格达条约“影响了印度的安全和这种安全的保持”<sup>[3]</sup>，是对印度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第二，伊朗利用巴格达条约组织干预印巴争端，导致印伊关系恶化。伊朗与巴基斯坦同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盟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是伊朗的一贯立场。1956年4月巴格达条约理事会在德黑兰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印度随即向英国、伊朗等国提出抗议，谴责巴格达条约破坏了中东的稳定，干涉了印度的内政。尼赫鲁说：“外国的干涉只是使克什米尔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只能意味着这个军事同盟在一个国家(巴基斯坦)同印度的纠纷中支持这个国家。”<sup>[4]</sup>第三，在解决果阿问题上出现分歧。1961年底，当印度兵分三路向果阿进军要求收回葡占殖民地时，美国政府公然表示反对。追随美国的伊朗政府也公开批评印军占领果阿，要求和平解决果阿问题。第四，在印巴战争中的全面对抗。随着1965年印巴战争的爆发，伊朗给予巴基斯坦以坚定的政治、外交、军事、道义上的全面支持，谴责“印度军队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径”<sup>[5]</sup>，不仅将进口的美国武器转运给巴基斯坦，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上极力主张“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和“在自决原则的基础上”<sup>[6]</sup>解决印巴问题，甚至还威胁要对印度进行石油禁运，印伊关系处于全面对抗状态。

与此同时，为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巴列维国王和尼赫鲁总理于1956年2月和1959年9月进行了互访，但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分歧依然严重。由于印度奉行“前进政策”，不断使用武力蚕食中国领土，从而导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当尼赫鲁总理向伊朗通报情况时，伊朗政府发表声明称“在印度成为侵略的牺牲品时支持印度”<sup>[7]</sup>。伊朗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反对社会主义中国，使得印度针对伊朗的不满之情有所缓解。

3. 全面发展时期(1967~1978年) 60年代后期，美苏的全球争霸处于战略转换时期，双方军事力量相对均衡，印巴战争因《塔什干宣言》的签署而宣告结束，英国从中东的撤退，印苏关系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在“六·五”战争中惨败，使得印度、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突显，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增强，促使印伊关系步入全面发展时期。

首先，印伊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60年代伊朗奉行“独立的国家政策”，在外交上“以符合国家利益为原则，最大可能地保障本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sup>[8]</sup>，摆脱了过分依赖美国的局面，积极支持成立

地区合作发展组织,并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印度自英·甘地执政以来,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突出经济外交,扩大印度的影响。印伊对外政策的调整为改善关系提供了可能。其次,印伊有着共同的地区安全利益。1966年英·甘地主张英国军队从中东撤出后,中东事务应由中东国家人民自己来处理和决定,中东安全必须依靠中东各主权国家的相互合作以及发展经济来实现。伊朗也改变了过去视美国为中东安全保障的观念,主张保卫波斯湾的和平与安全完全是沿岸国家的责任。印伊共同的地区安全利益为两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再次,巴基斯坦在伊朗外交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为实现地区大国强国目标,伊朗认识到发展与印度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意识到印伊贸易的巨大潜力和伊巴贸易的局限性,强调必须独立地处理与第三国关系,不愿因巴基斯坦因素而严重妨碍印伊关系的发展,这为印伊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机遇。再其次,印度国内的舆论压力。印度长期奉行亲阿拉伯政策,但阿拉伯国家对中印边界战争和印巴孟加拉战争反应冷淡,要求重新评价印度亲阿拉伯政策的呼声高涨,使得印度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口。印度认为与阿拉伯国家相比,伊朗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大可能通过转让武器的方式鼓励侵略行为。”<sup>[9]</sup>因此,谋求与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伊朗的接近便成为必然选择。最后,经济互补为印伊联合注入活力。伊朗拥有对印度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丰富石油资源、资金和信用贷款,但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原材料和工业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而在这些领域,印度正好可以满足伊朗的大部分需求,且价格相对低廉。同时,印度面临的原油短缺、资金匮乏等问题也可通过与伊朗开展合作得到满足。

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印度与伊朗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第一,高层领导人频频互访,成果颇丰。伊朗国王三次访印,印度总统和总理四次访问伊朗,部长级访问更多。1969年1月印度伊朗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双边经贸合作走向机制化。1974年4月英·甘地访问伊朗,印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一揽子协议,达成了任何一国与第三国的关系都不应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第二,广泛开展经贸合作。印伊就库德雷穆克铁矿、芒格罗尔港口、卡纳塔克铝厂等工程的建设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经贸合作成效显著。第三,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合作,相互支持。1974年10月,伊朗国王巴列维在对印度进行访问时提出建立“印度洋经

济共同体”建议,受到印度的欢迎和支持。同样,伊朗对印度的“和平核试爆”也予以支持。第四,文化交流活动持续不断。1974年,印伊签署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双边文化交流协定,以带动印伊关系的全面发展。

当然,在印伊关系全面发展时期,巴基斯坦因素依然给印伊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使得双边关系出现波折。1969年9月,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伊朗支持巴基斯坦抵制印度与会代表的立场。印巴孟加拉战争爆发前夕,英·甘地总理派特使向伊朗通报了孟加拉国局势状况,希望伊朗支持印度。但伊朗坚持孟加拉难民问题是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干预巴基斯坦内部事务。印巴战争爆发后,伊朗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坚决反对肢解巴基斯坦,拒不承认孟加拉独立。直到印、巴、孟三方签署协议,印度表示尊重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印伊关系才重新恢复正常。

4. 艰难曲折时期(1979~1991年) 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苏争霸更加激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巴关系再度密切,美伊关系紧张,两伊战争爆发,改变了西亚的力量平衡,印伊关系进入艰难时期。

1979年伊朗巴列维政权被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印度对伊朗政权的更迭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伊朗内部事务,反映了伊朗寻求国家自主和不受外部大国影响谱写独立进程的愿望,于是对伊朗新政权迅速地予以承认。印度批评美国营救人质是军事冒险,加剧了紧张形势,欢迎伊朗回到不结盟运动中来;为了促进印伊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1983年7月成立了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尽管印度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但却未能改变印伊关系陷入低潮的趋势。

印伊关系艰难发展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印伊意识形态迥异必然导致由于伊朗的宗教政体与印度的世俗化政体在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霍梅尼主张政教合一,反对世俗化,认为伊朗肩负着向世界输出革命、领导实现全球伊斯兰化的神圣使命,这必然会危及到世界穆斯林人口第二大国印度的安全、稳定和国家利益,甚至导致伊朗干预印度的内部事务,因而严重制约着印伊关系的发展。其次,印伊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不同。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到伊朗的安全,但是印度与前苏联由于签署友好条约而建立“特殊关系”,对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现实竟熟视无睹。而霍梅尼主张“既不要西方,也不要

东方,只要伊斯兰”,强烈谴责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关系紧密,而印伊关系趋于疏远。第三,对待两伊战争的立场不同。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和恢复两伊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它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伊争端,努力寻求解决两伊战争的方案,严格保持中立立场。伊朗对印度未能公开谴责伊拉克的侵略和在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表示不满,指责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国在1986年发表了一个“片面声明”,不能为伊朗所接受。第四,克什米尔问题依然是发展印伊关系的障碍。伊朗向克什米尔穆斯林游击队提供财政援助和支持,并邀请克什米尔穆斯林联合阵线领导人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宗教会议和参加伊斯兰革命日庆祝活动,这种干预印度内部事务的做法只能激化印伊矛盾,妨碍印伊关系的发展。最后,印度国内的教派冲突的影响,1992年12月阿约迪亚清真寺被毁,伊朗要求印度修复清真寺,安慰精神受到伤害的穆斯林,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哈梅内伊指出所有穆斯林和穆斯林国家都站在印度穆斯林一边<sup>[10]</sup>,伊朗掀起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印国内的教派冲突给印伊关系的正常发展蒙上阴影。

5. 战略合作时期(1993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却更趋激烈,求发展、谋合作、促和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印伊要求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第一,开展经贸合作成为印伊发展关系、增强国力的强大动力。80年代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孤立和封锁,使印度成了向伊朗出口廉价工业技术产品的主要国家,能源大国伊朗也看准了印度这个正在崛起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经济上的这种互补性,为印度伊朗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二,稳定中亚成为促进印伊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冷战后,中亚各共和国因其地缘政治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成为超级大国和伊斯兰国家的争夺对象。由于伊朗是惟一接近阿富汗、中亚、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国家,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与伊朗的双边关系,扩展它在中亚的商业市场,与伊朗联合在中亚扮演有影响的角色。同时,为了生存和发展,伊朗必须稳定与中亚诸国和印度的关系,需要印度尽可能多的技术援助和资本输入以扩展它在中亚的经济影响。恰恰在稳定中亚这个问题上,印度与伊朗的目的和需要不谋而合。第三,合力确保阿富汗问题朝着符合印伊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是密切印伊关系的纽带。阿富汗地处南

亚、中亚和西亚的交汇地带,地缘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前苏联1989年撤出后,阿富汗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和美国等的支持下异军突起,使印度和伊朗同时感到了对它们边境的安全威胁。伊朗担心与自己有教派和政治矛盾的塔利班在边境从事毒品贸易和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迫害,影响自身的稳定,而印度则担心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从事“越境恐怖主义”活动,危及自身的稳定和安全,于是印度与伊朗两国商讨联手打击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和边界毒品贸易的措施,加强了经济和安全合作,促进阿富汗问题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印伊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朝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迈进。首先,首脑外交成果显著。印伊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伊朗保证对印度的领土完整给予充分支持,无意干涉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印度内部事务问题,反对将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承认巴布里问题是印度内部事务。印度允诺预防和制止破坏宗教圣地事件的再次发生。其次,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合作。伊朗支持印度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发挥作用,1994年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说服巴基斯坦撤回了关于克什米尔人权问题的提案;1996年伊朗邀请印度参加在德黑兰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地区会议,联合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发挥特别作用。再次,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1995年伊朗与印度、土库曼斯坦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为印度和中亚的商品经过伊朗陆路进行贸易创造了条件。印伊签署了5个关于在旅游、通讯与邮政服务、制止毒品交易、环境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最后,确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依访问伊朗,印伊两国不仅签署了3份谅解备忘录和两份议定书,而且还发表了《德黑兰声明》,决定建立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善和加强两国已有的友好关系,使印伊关系迈上新台阶。

在展望印伊“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前景时,我们应当正视印伊双方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冷战时期印度的不结盟和伊朗的结盟政策的歧异、伊美结盟与印苏结盟的对立等因素已因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但是,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等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依然影响着印伊关系的发展。首先巴基斯坦阴影依然难以驱散。在历次印巴冲突中,伊朗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直到1974年4月印伊达成发展相互关系不受第三国关系影响的共识,才使得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

多年来,印伊两国一直为建立一条从伊朗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而努力,但印度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建设一条经过巴基斯坦到印度的陆路输气管道的建议。由此可见,印伊关系中的巴基斯坦因素仍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伊朗不大可能为了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而完全割舍它与巴基斯坦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印度要完全超越巴基斯坦而与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密切交往也并非易事。其次,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争端的焦点,伊朗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主张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在自决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克什米尔问题。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问伊朗,伊朗向印度保证不干涉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印度内政。事实上,伊朗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的是“两重性政策”,一方面保证不干涉印度内政,另一方面向巴基斯坦表示坚决支持克什米尔穆斯林争取自决权的斗争,这必然为印度伊朗关系的发展留下隐患。拉夫桑贾尼表示查谟—克什米尔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问题,也是一个伊斯兰问题,“任何损害巴基斯坦的行为,一般说来,也当然损害伊朗。我们拥有共同的命运。”<sup>[11]</sup>再次,伊朗的伊斯兰外交与印度国内的教派冲突错综关系仍将长期存在。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伊斯兰理想主义色彩,它坚信传播和保护伊斯兰思想是它的神圣使命,援助保护穆斯林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印度严重的国内教派冲突将使得印伊关系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维拉亚提外长强调:“假如印度或其它地方的穆斯林受到压制,或者他们的处境困难,我们会基于人道考虑和伊斯兰原则决定给予支持。对于克什米尔也同样如此。”<sup>[8]</sup>这将会对印度穆斯林带来影响,进而危及到印度的安全。教派冲突一直是印度社会的一大痼疾,近年来印度人民党等政党大打“宗教牌”,利用印度教徒的宗教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使印度教原教旨主

义异常活跃,而穆斯林分裂主义活动有增无减,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派冲突频繁发生,将使得印伊关系的发展经历曲折坎坷。

综上所述,尽管2001年印伊两国确定建立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但由于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印度国内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教派冲突此起彼伏,伊斯兰教理想主义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印伊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因素依然如故,所以在21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总结历史经验,只要印度伊朗双方能够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发展两国关系不受第三国影响,将双边在经济上合作的巨大潜力转化为现实,以经贸合作深化和巩固政治关系的发展,印伊的传统友谊才会再结硕果。

### 参考文献:

- [1] 贾·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 [2]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 国际条约集[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72.
- [3] 人民日报[N]. 1956-02-13.
- [4] 刘芬. 印度[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 [5] Khalida qureshi. pakistan and Iran A Study in Neighbourly Diplomacy. Pakistan Horizon, (Karachi) Vol. 21, no. 1, First Quarter, 1968.
- [6] UN.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20th Session, 1362nd Plenary meeting, 14 October, 1965.
- [7] A. K. Pasha. India, Iran and The GCC states. New Dehi, Manas Publications, 2000.
- [8] 穆罕默德·巴列维·礼萨. 我对祖国的职责[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 [9] Shahrar Chubin, Iran: Between the Arab West and the Arab East, Survival, London, Vol. 16, no. 4, July-August, 1974.
- [10] Times of India. 8 and 23 December 1992.
- [11] The Pioneer, September 9, 1992.

[责任编辑 刘 欢]

##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Iran Since 1947: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HAO Xir gang

(Institute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Iran was cold and intense in the 1950s, 1960s and 1980s. Despit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n a number of issues, India has maintained fairly extensive relations with Iran in 1970s and 1990s. Although India and Iran had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Central Asia and the Western Asia about the issues of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nd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2001, Indo Iranian relations have been marred by these issues such as the Pakistan factor, the Kashmir issue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m to be true friends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India; Iran; relations; problems; prospect